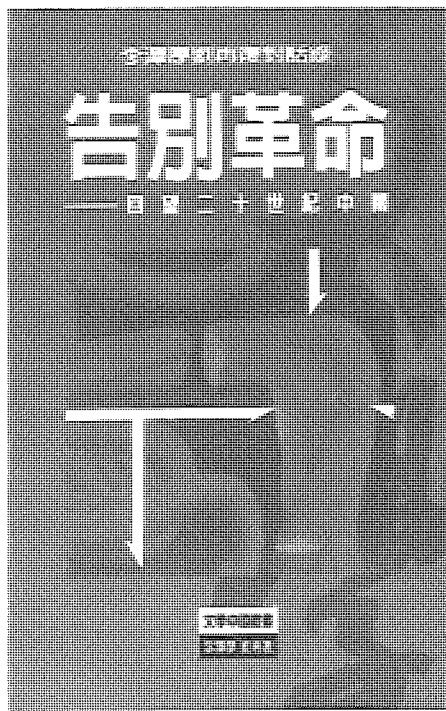


# 讀《告別革命》

## ——致李澤厚、劉再復

● 鄒 讜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

澤厚、再復教授：

今承賜寄大作《告別革命》，仔細閱讀，此書雖以對話錄形式發表，但對中國二十世紀之文化、思想、政治、文藝有極深刻之分析，引起我深沉的思索。我的著作除《美國在華之失敗》（*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之外，都是隔「洋」觀火之作；你們的著作不僅是學術之探索，更是心靈上的反應。你們兩位都是早熟的天才，我是苦學磨練出來的學究，四十歲後方有成名之作，七十歲左右才開始重新整理思想體系。你們思索寫作以建國後之情況為主要對象，而我的親身經驗是30、40年代的革命時期。你們是哲學、美學、文學思想家，視野廣闊，思索深遠；我是政治學者，所受的訓練是鑽研個案與具體史實，並以此為專業。

\* 此文是鄒讜先生致李澤厚、劉再復二位的一封長信，由李、劉轉本刊。經鄒讜先生同意並審定，摘要刊出，謹致謝意。

我們的背景、經歷、專業與天份，雖然不同，但是對基本問題，特別是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方法、歷史觀、價值觀等的看法，其實很接近：縱有不同，亦只是提法上的差異，並不是基本的矛盾。此外，你們對某些問題有明確的理論與觀點，而我則未能完全下結論。

我們研究的主題是中國二十世紀政治文化的複雜性、革命的持久性、源遠流長的傳統對現實所生發的影響。探索這些複雜無比的問題，我們固然要求助於各方面的思想、概念與論點，但對於以西方傳統與歷史經驗為基礎的學說必須有所選擇，並加以自己的闡釋，方能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了解從而總結自身的經驗。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而得的學理命題，才有它們的獨特性與創造性。

澤厚先生研讀、寫作、思想形成的時期都是在建國之後，選擇馬克思主義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出發點是很自然的。但是在70年代，澤厚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與當時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這就是再復先生所說的「即把生產力(科學技術)看作決定因素」<sup>①</sup>。這個闡釋與西方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的大師、現任牛津大學講座教授柯文(Gerald A. Cohen)在他早年成名之作中的提法不約而同。在西方強調「經典馬克思主義」不難，而在中國提出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獨創的闡釋。鄧小平從自己的經驗反省中國建國後的歷史，也在1978年正式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sup>②</sup>。

你們不但以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為出發點，並且用大量親身的經驗，論述「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和「國家」這些概念和理論在中國建國後的具體影響：並以「迷信意識形態」、「迷信戰爭經驗」來概括建國後一切錯誤的根源，敘說這些思路如何阻礙經濟發展、文化提高、社會進步和政治的常規化、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戰爭時期的「黨的一元化領導」加強了一元化的政治，促使政治、文化、道德的一體化，置整個社會於國家絕對控制之下。你們對1949年以後出現的各種錯誤的分析，是在整個思想系統中上下相關、左右相連的議論。

在這裏我想補充一點，階級鬥爭以長期內戰的形式在中國出現，戰爭時期的經濟、戰略策略、組織與制度變成了毛澤東思想這個非常具體的意識形態的內容。在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幾乎瀕於崩潰，整個社會的傳統道德價值標準大都失效，而新的標準又未能建立，因此思想、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制度、行為的正當性，完全決定於政治行動的成敗。毛澤東的措施，使中共「從零到有」、「從小到大」，最後取得勝利，因此毛澤東思想與毛本人在大多數人心目中不僅有無限的權威，也有道德上的正當性。但是毛澤東思想與毛從傳統帶來的治術和個人獨特的作風，不但不適合經濟發展、和平建國的需要，更導致「大躍進」與文革的巨大悲劇。而這兩個悲劇，就是「迷信意識形態」和「迷信戰爭經驗」的結果。

我們求助於西方的學說必須有所選擇，並加以自己的闡釋，方能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了解從而總結自身的經驗。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而得的學理命題，才有它們的獨特性與創造性。

現代政治學理性選擇論中，社會結構決定人類有效的行動的範圍。但是可行的選擇不只一種，而這些選擇又可以改變以後的歷史，因此歷史就沒有必然的規律。准此，人的選擇也是歷史偶然性的根源。

這些結論與命題只能在中國的歷史與實際情況中找到，它們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對世界社會科學、對現代馬克思主義批判的獨特貢獻。從西方理論出發，但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作出西方學者所看不到的結論，這是中國學者對世界思想理論的貢獻。

這個研究中國問題方法的應用，更進一步的體現於你們「二律背反」的概念。它貫通全書，將個別結論與命題，連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澤厚先生從康德對「純粹理性的背反」的論述引伸出這個概念，然後用於他的美學，再復先生的主體論也源於康德主義。在《告別革命》中，這一概念轉變為你們的歷史觀、認識論，並據之作為分析中國實際政治與人類行為的理論基礎。甚至你們提出的主張與目前的現實，也屬於「二律背反」的範圍。「歷史主義」與「道德主義」的「二律背反」就是一個實例。

更重要的是，你們從討論康德的學說中，提出了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這兩個既是在學術上又是在政治行動上的最基本問題。澤厚先生在《批判哲學的批判》中指出：「必須極大注意到偶然性、多樣的可能性和選擇性。」<sup>⑤</sup>你們在《告別革命》中又強調「一個歷史人物的出現，就是一種偶然因素」；又說「個人的偶然因素可以在歷史上起很大作用，並不一定是必然結果，也不是必然律能預計到的」<sup>④</sup>。

和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論說密切相關的，是結構決定論與個人選擇的功能的問題。澤厚先生在《批判哲學的批判》上說：「因果不是線性

的機械決定論，系統的複雜結構形成了多元和網狀的因果，可能性選擇的數字極大，而任一選擇對整體系統和結構均將產生影響。」<sup>⑤</sup>這個提法與現代政治學中理性選擇論的看法相同。一般來說，社會結構決定人類有效的行動的範圍。但是在社會結構劃定的範圍之中，可行的途徑不只一種。其中有些事半功倍，有些是代價大而成效小。政治行動者可以從中選擇其一，而政治家亦可以發現、創造並實行一種新的可行途徑。這在歷史轉變的時期有決定性的作用。根據這個理論和中國革命建國的歷史，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新命題：「理性選擇的創新性，系統性和戰略互動性就是宏觀歷史變化包括政治社會系統轉型最直接的微觀機制。」<sup>⑥</sup>人類既然可以在一定範圍內對自己的前途作出選擇，而這些選擇又可以改變以後的歷史，因此歷史就沒有必然的規律。准此，人的選擇也是歷史偶然性的根源。

在方法上有一點很重要的，也要在這裏提出。你們兩位對西方的理論經過思索後既有選擇，又有摒棄。澤厚先生說「告別現代，回歸古典，重新確立人的價值」，要求「少來點海德格爾，多來點波佩爾」，「我們現在更需要的仍然是科學理性，而不是海德格爾和德里達、富柯那一套」。我完全贊成這個看法，我有時也想到你們提出的問題：「把理性否定了怎樣辦？」<sup>⑦</sup>再復先生在另一次對話中說明了科學與理性的關係，這也是否定方勵之全盤西化或全方向西化的理論根據，因為「精神層面上，各國各民

族各種人要求很不一樣……精神層面的現代化不是科學化，而是尊重精神需求的多元化，即主體價值需求的多樣化」<sup>⑧</sup>。

讓我談一些比較實在的問題。我們要用「實用理性」去追求社會理想，它必須是以追求多元化、多體化的社會為目標的，這是因為人的性格愛好生來不同，成長的環境亦大有差異，只有多元化的社會、文化方能適應各人不同的需求、偏好、欲望和理想，而多元化社會與文化的前提是國家與社會分離。多元化社會最基本的原則是「人是最高的價值」。這些思想你們都已說得很清楚，這也是我提出「全能主義」的動機。國內很多人接受這個詞，以為它不過是比較「好聽」的「極權主義」的代名詞，但它其實是用來專指國家—社會關係的一種極端形式。在全能主義社會中，國家可以佔領社會所有空間、控制所有社會領域和人的各方面生活，而不受道德、宗教、法律的限制。中國建國以後，就是一個全能主義的國家社會，在文革時臻至極端，比蘇聯更徹底。

但是「全能主義」這個概念與「極權主義」有基本不同之處。在「極權主義」的概念中，國家—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個人獨裁、無產階級專政、一黨統治）不能分開，有其一必有其二，並且兩者同步增長。我覺得需要用「全能主義」一詞專指國家—社會關係的一種形式，而不涉及政權性質。這樣我們就可以提出一個新的、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是否會影響政權性質的變化？我

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國的變化將以國家—社會關係變遷開始，最終將會引起政權性質的變化，但是這個過程不是必然的。人的選擇與政治行動者的戰略、策略，可以影響這個過程的速度，以及多種可能的前進與倒退的形式，甚至過程的終點。這是「全能主義」與「極權主義」根本不同的涵義。

國家、社會、意識形態、文化一體化的根源是政治的一元化，其基本觀念是：最高權力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多元主義政治應是社會理想的核心。多元主義不但應在政治領域、文化領域被應用，在經濟領域也如是。澤厚先生說：「『走自己的路』，就包括創造經濟上和所有制方面的新形式在內。我現在倒願意強調目前要保持一定的國有資產，否則政府權威和宏觀調控就會失去足夠的基礎和必要的力量。」<sup>⑨</sup>這個看法，我可以同意。尤其是在目前國際環境中，國內私人資源缺乏的情況下，中國國防工業，只能是國有企業。但這看法與很多經濟學者的主張背道而馳，他們從美國新古典經濟學說學到了「產權必須落實到人」的命題，認為中國亦應如此。

你們有關「二律背反」的想法，最初在澤厚先生的《中國現代思想史》中以「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提法出現，我在拙著*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中也提到相似的概括。我認為中國要在二十世紀重建政治社會，有兩個衝突的作法或構想：一個是重建權力集中的、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統一中國維持政治社會穩定，佔領

「全能主義」與「極權主義」有基本不同之處。在「極權主義」的概念中，國家—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個人獨裁、無產階級專政、一黨統治）不能分開，有其一必有其二，並且兩者同步增長。「全能主義」一詞則專指國家—社會關係的一種形式，而不涉及政權性質。

我認為中國要在二十世紀重建政治社會，有兩個衝突的作法或構想：一個是重建權力集中的、強有力的政治權力，統一中國維持政治社會穩定，佔領控制社會與經濟各領域；另一個是發展與動員人民的精力、才能與創造力。結果是第一個作法壓倒第二個。

控制社會與經濟各領域；另一個是發展與動員人民的精力、才能與創造力。結果是第一個作法壓倒第二個<sup>⑩</sup>。我研究的着重點是，革命的過程如何引導到建國後的發展。

澤厚先生提到「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的二律背反」和「道德主義」與「歷史主義」的優先次序的問題<sup>⑪</sup>。澤厚先生所講的「歷史主義」就是你們所說的「經典馬克思主義」，是指經濟發展優先，「人的吃飯」問題是其他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而在中國「倫理主義」、「道德主義」就是毛澤東思想、他的意識形態的一個中心部分。雖然毛也要發展經濟，但是他的「倫理主義」、「道德主義」既是經濟發展的目的，又是經濟發展的手段：既是國家社會的目的，又是穩定和建設國家社會的手段。毛也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修正。

中國「二律背反」所產生的結果，是一律壓倒另一律。在政治上，「二律背反」表現於兩極分化、敵我分明、全贏全輸的結果，這就是他們屢次提到的「你死我活」、「互相廝殺」。

最後讓我提出兩個不能完全同意你們的提法：

第一是否定革命的問題。我完全同意改良優於革命，我多年前和中國同學閒談中，也說過一些否定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革命的話。在歷史實際政治上告別革命的觀點可以上連英國改良主義政治與法國革命的對比：下連蘇聯的崩潰，中國的嚴重災難。在思想上可以接連柏克(Edmund Burke)以來的保守

主義思想，一直到最近幾年尤其美國共和黨1994年選舉勝利的政治潮流。此外，從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的立場也可以引出告別革命的論點。但是我始終對這個問題不能下結論，也許辛亥革命、國民黨革命(北伐統一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歷史沉澱」不是完全消極的。

幾年前我曾提出一個分析革命的方法，說明不是所有革命都是「全贏全輸」的鬥爭。例如近年東歐的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的革命，就不是「全贏全輸」、「你死我活」。一般的說，民主主義的革命都不是「全贏全輸」的鬥爭，羅斯福新政是改良性的「革命」，東歐某些國家出現的是革命性的改良。我認為中國二十世紀的悲劇根源不一定是革命，而是「全贏全輸」的鬥爭形式。革命有一定功能，革命以後可以建立民主政治，美國革命、東歐一些國家的革命都是實例。相反的，「全贏全輸」的國內鬥爭形式，和最高政治權力是單一的、不能分割的思想，總是以各種形式的專政為結果。

革命總是有不理性、非理性的成分，但是我以為中國革命過程中很多行動和政策、戰略與策略都是很「理性的」。中國革命比法國革命理性得多。中國革命過程中的理性行動與政策，不是來自革命本身，而是來自一個政治多元社會內的勢力對立的結果：是力量微弱一方在戰略上、策略上、政策上、制度上的反應(當時中國革命的對峙力量是軍事力量雄厚的國民黨)。建國後，政治趨於一元化，理性的成分逐漸減少，大躍進和文革是非理性

表現的最佳範例。我在想，中國革命中的理性行動與政策是否與儒家的「實用理性」的傳統有關？

第二點不能完全同意你們的，是有關「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既是大致的四個邏輯程序，也是大致的時間（歷史）順序，這個提法<sup>②</sup>。你們的見解若只應用於中國，我可以同意。不過我以為更妥當的提法是：「經濟發展 + 社會正義 + 個人自由 → 民主政治」。可是，這個時間的順序組合不是普遍的規律，也不是一個邏輯程序。這四種社會現象在不同的時間與具體情況下，就會有不同的排列和組合：它們之間是統計上的互相關係，是概率性關係。多半經濟發達的國家有穩定的民主政治、思想自由、龐大的中產階級，但是經濟不發達、沒有龐大中產階級的國家也可以有民主政治。例如，印度在獨立的時候經濟非常落後，但是在英國殖民地教育下，和在實際統治印度的制度和過程中，培養出一批思想界、學術界、法律界、公共行政領域（官僚機構、法律制度）的精英，他們全心全意的接受英國的政治制度（包括思想、言論自由的保障），還加上社會主義思想，所以建立了一個一黨獨大的民主制度。在歷史上、實際政治上，這四種社會現象的排列組合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也就是說有政治行動者的選擇的因素。

我們應當在多種不同的「主義」中找到你們所提到的共識，學術建設是找到共識的一個基礎。我欣賞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義<sup>③</sup>，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如何在多

種互相衝突的「主義」、世界觀與宗教之中，尋找一個互相重疊的共識的大問題。一個多元主義的國家，也必須建立在一個共識之上。

冒昧披陳一些尚未完全成熟的意見，以就教於高明，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促進二十一世紀「文藝復興」並「實用理性」社會的建設。

祝好

鄒讜 謹上  
1995.8.9

中國二十世紀的悲劇根源不一定是革命，而是「全贏全輸」的鬥爭形式。這種鬥爭形式和最高政治權力是單一的、不能分割的思想，總是以各種形式的專政為結果。

#### 註釋

①④⑦⑧⑨⑪⑫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序〉頁2：頁36-38；53；85-86；42；22；24。

②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87。

③⑤ 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34；234。

⑥ 參拙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204、216-22。

⑩ Tang Tsou: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221-60.

⑬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鄒讜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利文思敦講座教授(榮休)。近著有《二十世紀中國政治》；*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Crisis in China;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以及刊載於各學術雜誌的論文多種。